

Lifetime Memories of China

Zhou Haiying's Photo Album (Son of Luxun)

「私のカメラが見たもの」魯迅の息子周海嬰の写真集

鐵
匠
人
間

魯迅之子周海嬰攝影集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Shanghai Brilliant Publishing House



镜匣人间

鲁迅之子周海婴摄影集

Lifetime Memories of China

Zhou Haiying's Photo Album (Son of Luxun)

「私のカメラが見たもの」魯迅の息子周海嬰の写真集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Shanghai Brillian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镜匣人间：鲁迅之子周海婴摄影集：中英日文版/周海婴摄；周令飞
主编.— 上海：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09.8
ISBN 978-7-5452-0314-1
I. 镜… II. ①周… ②周… III. 摄影集—中国—现代 IV. J4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26451号

题 词：贾庆林
摄 影：周海婴
主 编：周令飞

出 品 人：张仲煜
策划编辑：叶 导
英文翻译：石 芳 庄继禹
日文翻译：余可扬 大川正信 祝子平
日文审稿：王 俊
责任编辑：叶 导
装帧设计：尔 思
技术编辑：李 荀
电脑制作：杨美玲

书名：镜匣人间
——鲁迅之子周海婴摄影集
出版发行：上海锦绣出版社
地址：上海市长乐路672弄33号
邮编：200040
网址：www.shp.cn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上海界龙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2009年12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12
印张：25
印数：0001-2000
书号：ISBN 978-7-5452-0314-1/J.249
定价：180.00元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Cataloguing –in– publication (CIP)

Lifetime Memories of China, Zhou Haiying’ s Photo Album (Son of Luxun): Edition in Chinese,
English and Japanese/ Photos were taken by Zhou Haiying; Edited by Zhou Lingfei— Shanghai:
Shanghai Jinxiuwenzhang Publishing House, 2009,8
ISBN 978-7-5452-0314-1
I. . Lens… II. . ①Zhou… ②Zhou… III. Photo Album—China—Modern age IV. J421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CIP Data No.126451(2009)

Inscriptions given: Jia Qinglin
Photographer: Zhou Haiying
Chief Editor: Zhou Lingfei

Producer: Zhang Zhongyu
Editor for planning: Ye Dao
English Translator: Shi Fang, Zhuang Jiyu
Japanese Translator: Yu Keyang, Dachuan Zhengxin, Zhu Ziping
Japanese Proofreading: Wang Jun
Executive Editor: Ye Dao
Graphic Design: Ye Dao
Technical Editor:Li Xun
Computer Design Support : Yang Meiling

Book Name: Lifetime Memories of China
Zhou Haiying’ s Photo Album (Son of Luxun)
Publisher: Shanghai Brilliant Publishing House
Address: No.33, Lane 672, Changle Road, Shanghai
Postal Code:200040
Website: www.shp.cn
Distribution: Sale of the books are sold in Xinhua Book Stores in China
Compositor : Shanghai Jielong Art Printing Co.,Ltd
Number of Edition: the first edition, first printed in December 2009
Typeface: 787×1092 1/12
Paper Capacity: 25
Printing: 0001-2000
Book Number: ISBN 978-7-5452-0314-1/J.249
Price: 180.00 RMB

All Rights Reserved

■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题词：

镜里万象 一瞬千秋

观周海婴委员摄影展有感

统一战线资料珍贵

戊子年国庆节 贾庆林

Inscriptions given by Jia Qinglin, member of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Political Bureau of CPC Central Committee, President of CPPCC

**A panoramic view is covered in the camera lens,
with history recorded in the snapshots.**

The material of patriotic united front is precious.

On the National Day of 2008 Jia Qinglin

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贾庆林题辞：

「レンズは捉えた！一瞬はいつまでも！」

周海婴委员个人摄影展感想

「統一戦線」貴重資料

2008年国慶節 賈慶林

鏡里萬象

一瞬千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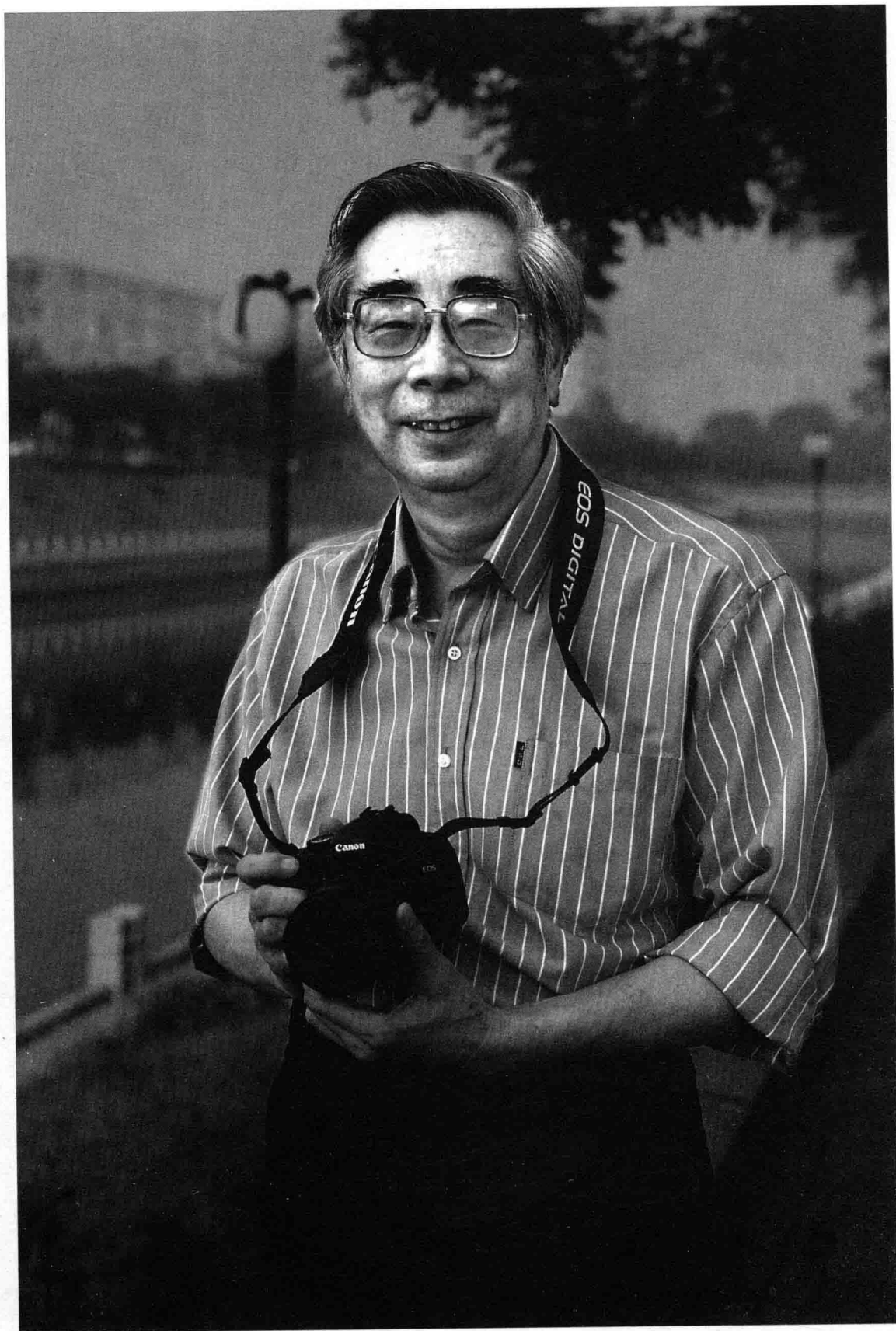
親周馥嬰委員攝影展有感

統一戰線資料珍貴

戊子年國慶節賈慶林







■ 2008年7月 北京

海婴使用Canon单反数码相机

July, 2008 Beijing

Haiying was shooting with Canon
single lens reflex digital camera

2008年7月 北京

Canonデジタル一眼レフカメラを
持つ筆者

目 录

1	镜匣人间——自序（周海婴）
10	摄影1943~1949
112	摄影1950~1965
214	摄影1966~1978
232	摄影1979~2008
258	摄影（彩色）1954~2008
283	作者简介
284	主编简介
285	给父亲八十岁的生日礼物——主编献辞（周令飞）
286	众说《镜匣人间》——评论精选
291	出版后记

content

1	Lifetime Memories of China——Preface (Zhou Haiying)
10	Photography 1943 ~ 1949
112	Photography 1950 ~ 1965
214	Photography 1966 ~ 1978
232	Photography 1979 ~ 2008
258	Photography (Color) 1954 ~ 2008
283	Author's Resume
284	Brief Introduction of the editor
285	Chief editor's delivering a speech (Zhou Lingfei)
287	Lifetime Memories of China in the public's view ——Selected remarks
291	Postscript

目 录

1	私のカメラが見たもの（周海嬰）
10	撮影1943~1949
112	撮影1950~1965
214	撮影1966~1978
232	撮影1979~2008
258	撮影（カラー）1954~2008
283	撮影者紹介
284	編集主幹紹介
285	編集主幹の祝辞（周令飛）
289	《私のカメラが見たもの》に寄せて——評論から
292	編集後記



■ 1947年 北京

海婴试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老式反光干版相机

1947, Beijing

Haiying was testing the old reflex camera of
photographic plates used in 1930s

1947年 北京

1930年代の旧式乾板カメラを試用する筆者

镜匠人间

——自序

这本堂皇名曰“摄影集”的册子里，记录着我的人生。上世纪四十年代，母亲曾为我的初学摄影相簿亲笔题写“雪痕鸿爪”、“大地蹄痕”。我和摄影有缘或许并非偶然。

我出生100天便被父亲抱去上海知名照相馆拍了照片，自儿时开始潜意识里对照相不陌生，甚至有莫名的新奇和亲切感。在镜头前我收敛调皮变成乖乖儿，这是镜头随人选择的奇妙，抑或是我10岁便拿起相机开始记录人生的机缘。

回溯到1936年秋末，父亲过世后，悲痛的母亲健康状况很不好，于是一位蔡姓阿姨建议母亲去杭州异地休养，她认为至少有助于减轻失去亲人的哀伤。母亲自然不能丢下方才8岁的我，让我随去做“跟屁虫”。蔡阿姨有一只黑色小型相机，不时地拍些风景。很快她看出我对相机的好奇，经不起我左缠右磨，允许我按了几次快门。这一年算是我摄影的开端，第一次拍照片，留下几帧如“渔夫撒网”之类的处女照。由于蔡阿姨是做党的地下工作，当时既没有留下底片，更没有留下她和我们一起的合照。凭记忆，那只照相机是德国蔡司厂的康太时Contax，大概是Carl Zeiss Tesser 50mm. F/3.5 镜头。

自此以后，我总有拿着相机拍照的渴望，这样走了大半辈子，拍过的底片竟有数万张。我忽然想到一件事，当年北京鲁迅博物馆曾有计划，在母亲身体稍好的时候请她辨认一些经年久存的年代老照片，搞清楚其中的人物和情节，母亲最终去世，成为永久的遗憾。在我迈向80岁的时候，我用了整整一年时间整理过去的所有底片，相信它们还有历史和人文价值，整理的结果便产生了这本摄影集。再静下心来，不顾酷暑难耐，把一些自认为重要的环节整理成文，也算是一个“准专业”老摄影爱好者的完美心愿。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照相机、底片价格的昂贵是今日无法想象的。1943年有一天，母亲比较富裕的朋友借给我一只小方木匣镜箱，由此我正式开始学习摄影了。记得那只镜箱用620底片拍摄，简单的二片“新月”镜头，提拉式两挡铁片光圈，快门一挡，孔径相当于f16和f22，约是1/30秒，只能在明亮日光下拍照。它还有一“常开”挡，使用时以秒为计，需要凭经验手控。底片感光度常规是25度(又称16定)，50、100度价格贵，属于中速及快片。弱光下假如能有100度快片用，是难能可贵的幸福。

1944年，我把积攒的零花钱和压岁钱合在一起，走进曾在橱窗流连“观察”了多少次的二手相机店。那些德国高

档机种是初学者不可企及的，有几只日本产仿制品，羞涩的口袋尚能担当，记得它是一只最便宜的翻盖皮腔式相机，日本f4.5镜头，康搬快门1~1/200秒，使用127底片，拍16张。我用过几个月之后，为了缴无线电夜校的学费，只好把它卖掉，说来这番话已经是65年前的悠悠往事了。到1949年之后，我还用过二三手的徕卡Leica相机，型号Ⅱ、Ⅲa、Ⅲb、Ⅲc都尝试用过，都是卖掉一架再换另一种试用，手里总是保持着一架回转。镜头包括Elema f3.5、Summar f2、Elema 90 f4.5等，但结影锐度不如蔡司Zeiss镜头。直到在北京大学物理系工作期间，才有机会接触单位从国外订货购来的如林可夫Linhof等高档专业相机。我持有过的机子，有苏联的卓尔基Zorki、基辅Kiev，德国蔡司厂的康太莎Contessa（五十年代产品，产量很少），日本的尼康Nikon、佳能Canon、美能达Minolta，最近常用的是佳能数码单反机Canon Eos Kiss Digital，有1000万像素。

择其优点是可以配合手头的旧Eos镜头使用，不忍可用者被冷落。虽然有专家指出，如果使用非专门设计用在数码机上的镜头，它有种种结影色彩和细节的缺陷，可我仅是一个“准专业”的摄影爱好者，这种组合已能满足我的需求。

1948年底，我在离开香港前往东北解放区前，花800元港币买下一架禄来Rolleiflex双镜相机，因为经济拮据，不够购买配置Tesser镜头，用约低于总价1/5的价格买下低一档镜头的Sornar f3.5机子。1980我拍《鲁迅画传》的部分照片，还使用这架用120胶片的禄来，结影虽然尚属松软，终可告慰历史。当时我用的是香港购买的柯达Kodak胶卷，黑白片分二种：红盒“万利”感光度50度；另一种绿盒全色100度感光片，价稍贵。两者约有1/5差价，使用时常常掂量自己口袋的经济力量，能省就省。这只相机连带遮光罩、黄滤色片花掉900港币。记得五十年代初，新华社大致有一个规定，记者拍摄新闻，每用三张底片应该有一张达标，可供报纸刊登。看来，我在东北期间拍摄照片，所用的是24卷在香港买的底片，算是很奢侈了。

在东北旅舍内，我在夜里利用漱洗间冲洗底片，使用香港买的显、定影成品药，均是柯达公司产品。开始在小平盆里用手提拉式冲片，没有用“微粒”显影，黑白底片约4分钟，定影10分钟。之后，我用接待组织发给每人每月的“零花”钱，在照相器材商店购买了一只二手日本产的显影罐，开始使用柯达Macrodal微粒显影剂冲洗底片，影像虽然细腻了，却牺牲了反差。自然，冲片还需注意温度和时间、药剂使用次数、补充时间或添加药剂，这已不是本文的范围了。

香港购买的底片用完后，我在上海旧货市场上可以淘到不少美军剩余的35毫米胶片，有柯达、安斯科Ansco之类，100尺及300尺一盘，可自己卷入底片匣用。这类底片一般虽仅过期一二年，然而由于大部分在军队库房保管不良，买十盘中只有二三盘能用。这“能用”却发灰，需要加大曝光量，减少冲片显影时间。我在五十年代初期曾废物利用这批“剩余物资”，勉强印放出一些效果不够理想的照片。还有一批美军“剩余物资”，是铁罐卷装的放大纸，背底防水且不粘胶水，据说是空军航拍材料之一，显影、定影后，可快速水洗晾干。那也是基本过期的，洗出的照片灰暗，我贪图它便宜，用过不少卷。

那个时期拍照补光是用灯泡内充填镁箔、镁丝的一次性闪光泡，价格昂贵且不易购到，许多商业摄影师便使用更老式廉价的点燃镁粉来闪光。镁粉里混入少量助燃的氯酸钾化学细粉，倾注在两片金属的反射板中间，根据场地大小，决定用剂之量，一般控制在安全范围，半克左右。因为用打火石点燃，发火时间不容易掌握，配合相机上慢门半秒以下拍摄，现场动态效果及表情必然生硬或丢失。于是我用小电珠（2.5伏，磨去1/3玻璃壳），让细灯丝接触闪光粉，通过相机内自制“同步”触点，通电闪燃，大致可同步到1/10秒速度。这一来效果比较优异，拍摄有些婚礼人物表情或体育拳击场面时，可以抢拍到动态。

暗房工作是从印片开始，它以底片的原大照片为成品，如需要将照片放大，放大机并非那个年代每个爱好者所能具备（当然也不是大多数摄影者经济能力所能承受）。我的第一台放大机是日本旧货，镜头很差。放大照片时，放大纸的反差档



次从软到硬，由0至5号；纸质又分光泽面、微粒面、绒面等，按不同需要选用。冲洗药液亦有多种不同变化。

在五十年代，彩色片冲洗并不普遍，我自己在暗房配彩色显影药剂和代用品，还试过反转片（亦称“幻灯片”）。因为彩色正片比较贵，我曾尝试用彩色负片制作反转正片。那个时代的彩色冲洗放大，温度要正负1度，尤以用冰块控制最难，其次是彩色放大，因外电的电压漂浮极易使色调变异，这些试验过程使我颇费心力。后来有了电子稳压电源，才减少了许多废品。如上所说的种种“痛苦”和愉悦，恐怕现代科技条件下的年轻人是无法体会的。

说起多年的暗房工作，早年我向新华社专家魏南昌请教，也和老学友于兆雄、卢学志等多位专业人士切磋。我也收过工作上的几个“学生”，包括我的三个儿子。而我最大的教训是过于信任买进的摄影药物，它们经常是质量伪劣，简直“坑”人！尤其是显影剂用的“对苯二酚”，成分经常很差。尽管我在调剂时天秤精度到十分之一克，尽管我还使用蒸馏水仔细调配，并坚持按标准的温度、时间精细地操作，却常常冲出极薄的底片！不能印放出优良的照片事小，丢失了珍贵的资料便无可弥补，酿成遗憾。

我的第一卷彩色照片是在香港买的安斯柯120彩色反转胶片，全卷大部分是1949年春天我在北京拍的颐和园、北海风景，晴空碧朗，云朵悠悠。送到上海南京路专门冲洗该品牌胶卷的店家冲洗，待我取回的时候，店主希望把其中的风景照片留在橱窗展出，称愿意用2卷胶卷交换，我心想10卷也不换。五十年代之后，我开始喜爱彩色，抗美援朝期间，欧美货断档，恰逢母亲访苏以及亲友隔三差五地馈赠苏联胶卷，或者用电影厂裁剩下的彩色胶片头，使我始终有彩卷可用。就这样用了各种彩色胶卷，也曾喜好自己动手冲彩色胶卷，也试过不同配方。今天回想起来，那时的“老彩色”胶卷存在稳定性差，色温不平衡，曝光度不易掌握等问题。加之使用和冲洗彩色胶片的因素太多，刚刚掌握规律，材料又变了，更没有色温的测量仪器，使我感到业余试验彩色照片，条件很不成熟，劳心劳力又劳神。

我珍藏着几本厚厚的黑卡纸老式相簿，错落有致地贴满大大小小的照片，那时我母亲细心地粘贴，有些用了三角形相角。页面上有很多母亲的亲笔题字和日期，每当我翻开这些相册，就像展现一个个故事。1948年，香港掀起了迎接“新政协”的热潮。议论新政协，拥护新政协，成为各民主党派政治生活的主题。李济深、沈钧儒等各个民主党派领导接到毛泽东主席电报，奔走相告，鼓舞甚大。估计解放军一过长江，全国很快就会解放，新政协即将召开。在香港地下党布置下，大家分途北上。母亲带我和多位爱国民主人士搭乘“华中轮”海船，从香港离岸，我在轮船甲板上拍下民主人士如郭沫若、侯外庐、沈志远、宦乡和党的领导连贯同志的照片，今日看起来竟是如此珍贵。又比如，在沈阳市的铁路宾馆大会议室内，民主党派学习讨论的会场，冬季下午室内光线不足，勉强用慢速拍了两帧，虽然清晰度差，又非广角镜头，能够留下这历史的瞬间，于国于民我心足矣！

那阵子在沈阳等候政协召开，民主人士文化娱乐活动的一种是撞击桌球，以体力消耗较小的“开仑”为主。在沈阳没见有人玩麻将牌，只有间隔地晚间打打桥牌，凑足四人就玩起来，用自然叫牌法，没有固定的搭档。记得参加的有章乃器、朱学范、沙千里、赖亚力，洪深则偶见参与。值得一提的是国民党资深将军李济深，也喜欢和大家玩在一起。他的秘书林一元经常在旁观席，给最年轻的我使眼色，别让李将军宕太多牌难堪。在大家的兴头上，我当时又值年少气盛，岂肯“放一马”！局后林秘书也无可奈何。回念此情，略感歉意，姑且当成一件趣事吧。

在我的数万张底片中，有一些最为得意、最有纪念价值的照片。首先是1948年从香港跟随民主人士前往东北解放区时拍下的。当时民主人士的活动，对外严格保密，没有摄影记者跟随，不似现在无论什么场合，记者蜂拥而至，快门咔嚓，闪光连连。而我的母亲处处“警告”我要自量“身份”，谨慎不能犯“错”，不能随意走动，不能自行离队伍拍摄照片……因此，东北之行虽极为重要，但照片数量很有限，我的这几帧照片也就成了见证历史的“孤本”了。这里有一件事还需提起，1948年冬我在沈阳期间遇到新华社老记者郑景康等几位摄影前辈，他们在简陋的条件下，用海碗装显影、定影

液，手工拉冲120底片。他们当时用的是普通“D-72”型显影剂配方，底片一串串晾干在房间内蔚为奇观。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党的新闻战线同志们的工作状况。那时郑景康亲手帮我冲出我自香港到沈阳期间拍的几卷120底片，留下最珍贵的影像，谨此向他们再一次表示感谢！

其次是“二六”轰炸的照片。1949年初夏，我从华北大学短期学习结束，廖承志建议我们几个“孩子”，各自补习所缺的高中文化课程，之后第二年去苏联求学。这样，我返回上海旧址霞飞坊寻师回炉。不久，抗美援朝开始，我在三楼阳台听到飞机投弹轰炸声，看到窜天的浓烟，这便是“二六”轰炸上海卢湾区。冲天黑烟被我拍了下来。隔天我又和表兄马永庆赶去现场拍摄残垣废墟，进入现场时，我们被警卫所阻，亏得那时候我们不知天高地厚地印了名片，叫做“海马摄影社”，凭这枚小片子，才得到许可进入警卫圈内。进去后我拍到了一批炸毁的废墟，还有伤亡家属悲痛欲绝的镜头。2008年春天，我又专程去了58年前的故地，只寻见路边一块纪念碑石，不知道什么时候、什么缘故被敲成两截，又用水泥粘合在一起，这种偶然的“不幸”和伤愈，令人唏嘘叹息！

再有几帧灯光人像似可以特别一叙。那是1949年冬，由杨子颐先生介绍我参加了摄影前辈吴寅伯的“上海摄影学会”，他们都是老一辈摄影家。之后吴先生到北京的人民画报社和中苏友协工作，我间或去问候请教。在上海期间，吴老主持学会活动，常请某一方面学者讲授各类摄影技术科目。我记得有一次邀请了京剧名演员言慧珠来会充当模特，那天专家教的是灯光“单灯”人像摄影，在一侧只用一只200瓦上下普通聚光灯，另一侧施加一块白色反光板，调度两者远近距离、角度方向，获取不同效果。对演员言慧珠的身形神态并不去刻意“摆布”，由她自由发挥，转动变化角度，有十几位摄影者前后左右抓拍，我也挤在边夹缝里按快门。过了两周言慧珠再度来到上海摄影学会，大家依次让她看自己的作品，我是最后一个把“习作”交给她，想不到她看了照片后凝视了我这个最年少的“学徒”，竟开口问“你可不可以把照片送给我？”我受宠若惊地当即应允，于是三张10寸精心制作的照片被她收藏了。

近70年来，我的摄影兴趣不减，从未间断却并不连贯，这与时局、运动、心情和工作、生活有直接关系。我拍摄的题材以人为主，也有随机的景物，那是我的审美观和兴趣的体现。我喜欢遇到机会抓拍性地留影，对导演、摆布没有好感。有一阵我使用徕卡Leica相机，它虽然有选影式对焦测距，但跟随动态却很迟滞，为了抓好瞬间距离的变化，我还自我训练用手指推拉测距杆，眼睛瞄视动作对象，在超焦范围内按快门，达到跟踪的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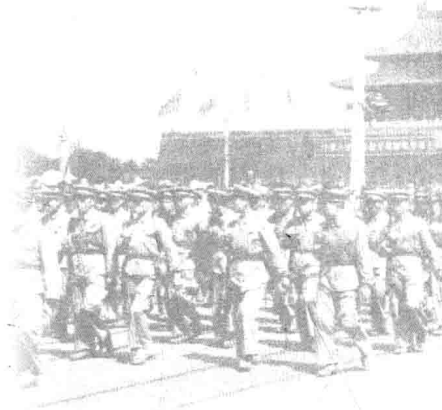
我经历过旧社会，对“社情民意”比较敏感，抓拍中有解放前的难民和乞讨者，也有解放后的所见所闻。我不为了“猎奇”，只希望让它证明时事。1950年我在辅仁大学读社会系，每学期就利用照片辅佐对社会、工厂的调查报告，曾受到系主任李景汉老师的肯定和表扬。我确实曾想过当个专职的摄影工作者，可是最终却还是钟情于科技。

在摄影中我找到的是自己的乐趣，如今却无意间为大家或小家留下了凝固的瞬间。再看今日，数码时代来临，照相机发生彻底革命，电子代替胶片，照相机的普及率造就了一代摄影族群，网络上数以亿万计的照片让人应接不暇，我依然努力地跟随时代的脚步，开始用新型摄影器材，摆弄着未知，同时却也在不停地回味。“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这本摄影集无疑是我在潮流中行驶的逆舟，毕竟这是我的拥有，姑且称之为“镜匣人间”。

在我80岁的时候，让这本集子留给我所爱的人。感谢所有帮助我的好朋友们。

周海婴

——鲁迅之子、全国政协委员





■ 1953年 北京

海嬰試用美国Speed Graphics 新闻相机

1953 Beijing

Haiying was testing American Speed Graphics news camera

1953年 北京

アメリカ製Speed Graphicsプレスカメラ
を試用する筆者

Lifetime Memories of China

—Preface

This so-called “Collection of Photos” is in fact a small chronicle of my ordinary life. As a photo-amateur, my first gathering of pictures was inscribed for encouragement by my mother in the 1940s with examples such as “Xuehen Hongzhao” (Swan goose’s claw printed in mud) and “Dadi Tihen” (Animal’s footprints in field), denoting traces of past events and causing my lifelong affinity for snapshot photography.

When I was 100 days old, my father placed me before a camera in a famous studio in Shanghai. From that day on, I think, I began to love photography and became a happy snapper at the early age of 10.

In late autumn of 1936, my mother was overcome with grief from my father’s death. Auntie Cai persuaded my mother to visit Hangzhou for recuperation. Naturally I was to go with her as I was a poor little boy of just eight. Auntie Cai had a little black camera which she used frequently, thus evoking my strong curiosity to touch it. I kept nagging her until she promised to let me try her camera, and I remember that year as the very beginning of my time as a photographer.

From then on, I have taken more than twenty or thirty thousand photos with my own cameras. I found out once that Luxun Museum in Beijing had a plan to ask my mother to identify and recognize old pictures and photos of her remote past, health permitting. But sorry to say, this plan was never fulfilled as she had passed away. Nevertheless, in that year I was nearly 80, so I sorted out all the negatives gathered from days gone-by and compiled this “Collected Pictures”. I believe it embodies both historical and humanistic values.

60 or 70 years ago, being a photographer was very expensive. In 1943, I started my career with a small wooden box, which one of mother’s friends had lent me. It was actually a simple and crude camera, built with a crescent-like lens (f16–f22) and a shutter (1/30 sec). It worked only in the daylight with ISO25 film. What a wonderful thing it would have been if I could have afforded to buy ISO50 or ISO100 film!

Next year I gave all the money I had to buy a second-hand Nippon copy instead of a high-grade German camera. I remember it was a better camera as it had a Japanese-made lens (f4.5), a Compur shutter (1–1/200sec), and it used 127 film. Sadly, after only a few months, I had to sell it to pay for my tuition fees at an evening radio school. Oh, that’s the story of 64 years ago! From those times up to 1949, quite a variety of second-hand or even third-hand cameras, such as Leica II、IIIa、IIIb、IIIc...etc, were passed from me to another person, although I only owned one camera at a time. At the end of 1948, I spent 800 Hong Kong dollars on a Rollefex, as I was leaving Hong Kong for the liberation area in the Northeast. This thing accompanied me right up into the 1980s. During the past 20 years I have worked with Zorky, Kiev, Contessa, Nikon, Canon, Minolta, etc, as if they were on a merry-go-round. Recently,



my favorite is Canon Eos Kiss Digital with 10 million pixels.

My early stage work was collected in several old-type albums, and these old pictures were carefully pasted by my mother. On their title pages you can always find my mother's inscriptions.

Among the large mass of negatives, there are quite a few essentials shots.

First are the memorable moments taken in 1948, when many democratic people of importance, such as Li Jishen and Shen Junru, responded to the appeal of Chairman Mao Zedong to attend the coming New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Under the arrangement of underground CPC members in Hong Kong, my mother, along with several democratic personages and of course me, went northward on the Huazhong ship. This picture is the valuable one which recorded the exact moment when Mr. Guo Moruo, Hou Wailu, Shen Ziyuan, Huan Xiang and CPC leaders were on the deck. And now the other one. This was taken at the conference hall of a railway hotel in Shenyang, in the dim afternoon light of winter. It is not a distinct vision, but the only existing copy of this historical moment.

The second series of pictures relates to the Feb. 6th Bombing in 1949.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Movement to Resist US Aggression and Aid Korea, the Luwan District of Shanghai was subjected to a bombing raid. I lived at the time in a second-floor apartment in Xia Fei Fang. The following morning, my cousin Ma Yongqing and I went to the scene, which was still untouched by others. Fortunately we were permitted to get through to the exclusion area by using the name of Haima Studio. As a result, a series of pictures taken of the ruins and the sad relatives of victims was produced. This spring, I made a special visit to the site and saw nothing but a broken monument spliced with cement, which caused all sorts of feelings to well up in my mind.

You had better also take a look at a few worthwhile portraits. In the winter of 1949, Mr. Yang Ziyi gave me the chance to join the Shanghai Academy of Photography directed by senior photographer Wu Yinbo. Uncle Wu regularly organized professional lecture courses. Once, I remember, a lecture about portrait-taking was being given and at the same time, Miss Yan Huizhu, a famous actress of Shanghai Opera, was invited to the worksite as a model. The lecturer taught us how to take a portrait by using only one 200w lamp and a single white reflector. There were more than a dozen people in the audience, and all were busy snapping the leisurely posed model. But I, as a humble snapper, could only try my best to make use of every bit of time and space. Two weeks later, Miss Yan came again to our academy in order to have a look at our "homework". I was the last one to be checked. Miss Yan, after gazing at my pictures for a while, said unexpectedly to me, "May I have them?" Three 10 inch pictures were later collected by her.

And so my enthusiasm for photography continued to go through hot and cold spells for almost 70 years.

Eventually I decided that I wanted to be a professional photographer, finally leaning towards up-to-date technology. As a snapper, I like to take a photo at random and never at predetermined conditions. I know I am good at catching everyday moments in ordinary life. I do so not for novelty, but for mementos of the time. I really enjoy taking pictures, because I believe that the camera can magically solidify any historical moment with its simple shutter.

Nowadays, everything is changing. Old-types of camera and rolls of film have been replaced with digital technology. New generations of photographers have emerged with the popular culture of digital cameras, and I have no choice but to try hard to catch up. So I call this collection "Reflecting on Days Gone By".

I dedicate it to everyone I love and want to express my sincere thanks to all my friends who have given me help.

Zhou Haiying

—Son of Luxun, member of CPPCC



■ 1949年7月 上海

海嬰試用Kodak-35相机。

July, 1949 Shanghai

Haiying was testing Kodak-35 camera

1949年7月 上海

Kodak-35カメラを試用する筆者

私のカメラが見たもの

——前書き

私の人生の軌跡が「写真集」と名付けられたこの本に記されている。

1940年代初め、当時まだカメラを習い始めたばかりの私のアルバムに、母親が直筆で「雪泥鴻爪（雲の上の鳥の足跡）」、「大地蹄痕（大地のひずめの跡）」（二つとも「小さな記念として何かを残す」の意）と書いてくれたことがある。私のこれまでの人生がカメラと何かの縁で結ばれているのも決して偶然ではないのかもしれない。

私が生まれて100日を迎えた頃、父は赤子の私を抱いて当時上海で有名な写真館に連れて行き記念写真を撮ったことがあった。そのお陰か、私は子供の頃からカメラというものに対して無意識的に馴染みがあり、むしろ妙な好奇心と親しみを感じていた。それ故、カメラの前では私はいつも腕白坊主ではなく良い子になってしまうのであった。これはカメラが私にそうさせるのか、私は10歳の頃から既にカメラを触り始め、このことは私が人生の記録を撮るきっかけとなった。

遡れば1936年の晩秋、父が他界した後、母は悲しみのあまり健康を害してしまっていた。そんな母を見かねた母の親友の蔡女史という方が、心の傷が少しでも和らぐようにと杭州へ行つてしばらく静養するよう提案してくれた。当然杭州へ行くならば、当時まだ八歳の私を上海の家に置いていくわけにいかないので、私は母の「金魚のフン」のように一緒に杭州へついて行くことになった。蔡女史は小さな黒色のカメラを持っており、時おりそのカメラで景色などの写真を撮っていた。私とそのカメラに興味津々な様子を察した蔡女史は、私のしつこい頼みに折れ、度々シャッターを押させてくれたりした。

恐らく、あの杭州で暮らした一年が私の撮影人生の始まりと言えるだろう。

以来、私は完全に写真撮影にのめり込んでしまった。カメラと共に今日までの人生を歩み、これまで撮った写真のフィルム数はざっと数万枚に上る。

ある日、私はふと昔のことを思い出した。それは私の母がまだ元気だった頃のことだが、当時、北京魯迅博物館は彼らが保管していた古い写真に写っている人物とその写真のいきさつについて私の母に教えてもらおうとしていた。しかし母は結局それを果たせぬまま亡くなってしまったので、そうした古い写真に関する詳細は永遠の謎となってしまった。私自身も年老いて今年80歳の節目を迎えるにあたって、今だからこそ自分がこれまで撮ったフィルムを急いで整理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考え、まる一年の時間をかけて歴史的、人文的な価値があると思うものを選択してこの写真集を編んだのである。また、心静かにこの夏の猛暑に耐え、重要だと思われる写真に注釈や説明を加えて仕上げたこの本は、一人の「セミプロ」ベテランカメラマンの長年の念願の結晶でもある。

1930、40年代、カメラとフィルムは現代では想像もつかないほど高価な代物だった。

1943年のとある日、母の友人でわりと裕福な方が、ひとつ小さな木製ボックスカメラを貸してくれた。それをきっかけに私は正式に撮影の勉強をし始めることになった。使用したのは620ロールフィルムだったと記憶しているが、レンズはごくシンプルな二枚のメニスカスレンズ、引き上げ式鉄の二枚羽、シャッターの調節は一つしかできないものである。シャッター速度：1/30秒、絞り：F16とF22であるので、晴れた日の昼間にしか撮影できなかった。当時はISO25のものが主流で、ISO50、ISO100のフィルムともなると値段が高くてとても手が出せなかった。だが高感度フィルムを使用すればシャッター速度が中速や高

速の場合にも対応できるので、当時もし薄暗い場所でISO1000のフィルムが手元にあつたならば、もつと様々な物を撮影できただろうにと悔やまれてならない。

1944年のある日、私はコツコツ貯めた小遣いとお年玉を手し、何度もショーウィンドー越しに覗いていた一軒の中古カメラ屋へ入った。そこに陳列してあつたドイツ製の高級カメラは私のような初心者には相応しくないので、結局安い日本製の模倣品を一台買ったのである。これは蛇腹折りたたみ式カメラで、絞り：F4.5、コンバーシヤッター：1-1/200秒、127フィルムの16枚撮りのものだった。しかしやつと手に入れたのも束の間、数ヶ月後には私の無線夜間学校の学費を払うため、やむを得ずそのカメラを手放さなければならなくなってしまった。もう遠い64年前の大昔の話である。1949年以降、私は中古のライカカメラのII、IIIa、IIIb、IIIcなども試しに使っていたが、一台売ってはまた一台試し買いし、自分の手元には結局いつも一台しかなかった。しかし1948年の末、香港から東北解放区へ赴く時、800香港ドルで買った一台のローライフレックスの二眼レフカメラは1980年代までずっと愛用していた。今まで使用した機種には、ソ連製のゾルキヤキエフ、ドイツのコンテツサ（これは1950年代製で生産台数も少なく稀少品である）、日本のニコン、キヤノン、ミノルタなどがあり、最近頻繁に使用しているのはキヤノンのデジタル一眼レフカメラ「Canon Eos Kiss Digital」で1,000万画素のものである。

私が若い頃に撮った写真は全て何冊かの分厚いアルバムに大事にとってある。そのアルバムは古くて表紙も粗末な黒紙であるが、母が丁寧に一枚一枚写真を貼ってくれ、それぞれの写真の側には母親の直筆が残っている。写真挟みも昔の三角コーナー式で、全部で数万枚もあるそれらの写真の中には、私の自信作や記念的な写真が数多く存在する。何作品か抜粋してここで紹介しておきたい。

まずは1948年、当時香港は「新・中国人民政治協商会議」（略して「新政協」と呼ばれる）の歓迎ムードが漂い、各民主諸党派による「新政協」の擁護や論議が盛んに行われていた。李済深、沈均儒などの各民主諸党派党首はその「新政協」に参加する毛沢東からの電報をうけ、解放軍が長江を越えれば彼らが中国全土を統一し、同時に「新政協」開会も時間の問題だろうと考え浮き足立っていた。

そうして間もなく皆は香港の地下組織の手配で別々に香港を離れて東北解放区へ赴くことになった。

母に連れられた私は多くの愛国民主人士と共に「華中輪」号に乗った。その時私は一枚の写真を撮っていた。それは船が香港を出港する際、船のデッキに郭沫若、候外廬、沈志遠、宦郷及び当時の党の指導者・連貫など多数の有名人が写されたものである。今にして思えばこれはかなり貴重な一枚でないかと思う。さらにもう一枚、当時沈陽市にあつた鉄道賓館内の大会議室で民主諸党派員が会議をする場面を撮った写真もある。あれは冬の日の午後で室内が薄暗く、私は無理に低速で二枚の写真を撮影した。考えてみればこの写真の露出時間も足りないし広角レンズでもなかったのに、この歴史的瞬間を捉えることができたのはこれ以上無い喜びであつた。というのも、1948年当時に民主諸党派人士達が香港から東北解放区に赴くことは対外的に極秘であつたため、当然メディア関係の記者達は同行していなかった。したがって、私が苦勞して撮ったあの二枚の写真はあの歴史を目撃した唯一の証だと言えるだろう。

その次は「二・六」空襲事件の写真である。1949年初夏、私は華北大学（現中国人民大学の前身）の短期学習を終えたのだが、廖承志の勧めで翌年にソ連へ進学するために高校課程の補習をすることになった。そんなわけで、私は上海の旧居の「霞飛坊」に帰り、私に補習をしてくれる先生を探すことにした。すると時を経ずして朝鮮戦争が勃発した。爆音が辺りに鳴り響き、三階の我が家のベランダから見えた煙は天に昇るほど濛々と昇り立っていた。これが後に「二・六上海盧湾区爆撃事件」として知られる出来事である。その時私はベランダから空一面を覆う黒い煙を撮影したのだが、翌日従兄弟の馬永慶と一緒に再び現場に急いで向かい、被爆の様子や廃墟を撮影しようと試みた。だが現場はすでに警備されており私たちは入ることが許されなかった。ところが、幸いなことに私たちはその時自分たちで勝手に作った「海馬撮影社」という名刺を持っていたので、それで警備を誤魔化してなんとか現場に入り、そこで爆撃の凄まじい威力、廃墟や死傷者たちの家族の悲しみなどをカメラに収めたのである。



今年にはいつてある春の日、私はわざわざその五十八年前の彼の地（爆撃現場）を訪ねてみた。辺りは一変し、道端に佇むたった一つの記念碑が見つかったただだった。しかも、その記念碑はどうやら一回折れたことがあるらしく、セメントで修復した跡が記念碑の真ん中に残っていた。この記念碑にも「不幸」や「傷跡」があり、これは単なる偶然なのだろうか！と考えると感無量であった。

他にも何枚かの人物写真について述べておこう。あれは1949年冬のことであるが、私は揚子頤先生の紹介で、先輩カメラマンの呉寅伯先生が主催する「上海摄影学会」に参加させてもらった。その学会のメンバーは皆ベテランカメラマンだったのでたくさんの事を勉強させてもらった。後々呉先生が北京の「人民画報社」や「中ソ友好協会」へ転勤した際も、私は度々先生のところに伺っては教えを請うていたものだった。上海にいた頃、呉先生はしばしばある方面に明るい有名な学者を招き撮影技術のノウハウを学ぶ、といった学会活動を主催していた。今でも印象深く憶えているのは、有名な京劇俳優の言慧珠女史がモデルとして会に参加してくれた時の事である。あの日の課題はただ一個の200ワットのスポットライトの光のみで人物撮影することだった。そしてわきに白い反射板を置き、これら二つの距離と角度を調節しながら如何にして撮影効果を向上するかのノウハウを学ぶのである。モデルの言慧珠女史には自由に様々なポーズや表情をしてもらい、私たち総勢十数名のカメラマンは彼女の周りを取り巻きながら撮影し、私もすし詰め状態の隙間から負けじとシャッターを切り続けた。二週間後、言慧珠女史が再び上海摄影学会を来訪すると、皆次々と自分たちが撮った写真を差し出して彼女に見てもらっていた。私も一番最後に自分の試作を彼女に手渡したのだが、驚いたことに彼女はこの一番若い生徒の私に向かって「この写真もらってもよいかしら？」と口にしたのである。私は驚いたものの、大喜びですぐに承知した。こうして三枚の10インチの写真、私が心を込めて撮った作品は言慧珠女史のコレクションに収まったのである。

初めてカメラに触つて以来70年近くもの時が流れているが、私の撮影に対する情熱は少しも色褪せてはいない。もちろん、その間の情勢、環境、気分、仕事及び生活等の事情によつて私の撮影活動は断続的になってしまったことはあるが、これまで完全に撮影活動を止めたことはなかった。正直に言えば、確かに私はプロのカメラマンになりたかったこともあったが、結局、科学技術に惚れ込んでしまった。それでも私はアマチュアカメラマンの目で人物や時には風景を撮り続け、それらの撮影作品の中には私が美しいと思うものや興味のあるものが体現されているはずである。私は一瞬一瞬のチャンスを捕まえて物事を撮るのが好きであつて、あの堅苦しい造形やポーズにはどうも好感が持てない。私は旧社会（中華人民共和国設立前）を経験しているせいか、社会情勢や世論に対して特別敏感で、その旧社会の難民や物乞いなどを題材に数多く写真を撮ってきた。無論、私の撮影作品には中華人民共和国が設立してからの私の見たり聞いたりした物事も少なからず影響しているが、しかし私の撮影はただの珍しいものの好きといった類ではなく、この世の中で起きている物語の証しを刻んできたのだと思つている。

長年の撮影活動を通して私は自らの喜びを発見してきたと同時に、沢山の歴史的な「瞬間」を残してきた。現在はもうデジタルカメラの時代に移り変わり、それに伴いフィルムが淘汰されてしまうなどカメラは根本的に改革されている。カメラがこれ程までに普及したことにより、今や新世代の「カメラマン」によるデジタル写真がインターネット上に溢れかえっている。私は依然として時代についていくべく新型の未知なるカメラ機材をいじくり回しているが、同時に過去を懐かしんでいる自分もまた存在する。「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学は逆流を行く舟の如く進まざれば即ち退く」という諺にある通り、この「写真集」はまさしく私の「時流に逆らつて進む船」である。とは言うものの所詮私が所有するものなので、この「写真集」を「私のカメラが見たもの」と名づけた。

この「写真集」を私の愛する人たちに捧げる。

出版にあたり尽力してくれた友人達に感謝を込めて。

周海嬰

—魯迅の息子、全国政治協商會議委員